

论诗人李白人生际遇对其现实诗风的影响

谢青芮, 谢承力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51)

摘要: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但其后半生更凭添了一种现实入世的色彩, 出现了不少现实主义的力作, 李白的现实主义诗作, 在浪漫主义诗风的背后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力量, 滋生的土壤是诗仙李白复杂多变的人生际遇, 使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凸现出现实主义的灵性。

关键词: 李白; 现实主义; 诗风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654(2010)02-078-05

On Poet Li Bai's Realistic Style Reflecting His Experience

X E Qingru, X E Chengli

(Huna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151)

Abstract Li Bai is a great romantic poet and he was more realistic in his rest life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his many realistic works. It was Li Bai's varied life experience that modified his works with realistic spirit and produced huge power of critical realism behind his romantic poetry style.

Key words Li Bai; realism; poetry style

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 写诗历史源远流长, 历代诗人多如星辰, 他们以各自的风格闪耀着光彩, 在这条诗歌星河里, 李白以其飘逸奔放直爽的风采显得与众不同, 成为古往今来无人能逾越的一座巅峰。浪漫主义诗人, 这是公认的评价。其实对李白的看待, 综其一生来看, 后半生更增添了一种现实入世的色彩。李白诗歌现存九百多首, 内容丰富多彩。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 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 是唐盛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真实艺术写照。

一、青年浪漫游历 形成激扬的诗风

李白(701—762), 字太白, 自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附近)人, 后移居绵州昌明(今四川江油县)^[1], 是兴圣皇帝二十九代孙, 其祖在隋末因犯罪被流放到西域, 唐中宗神龙初年, 由西域逃回, 客居巴西(《二十五史·新唐书》)。李白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富有的家庭, 他“五岁诵六甲, 十

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 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 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 道教影响, 几乎伴随他的一生。李白一生受到了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 其中, 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白少年时代生活于道教浓郁的蜀中之地, 自然耳濡目染, 后又学习了纵横术。在他的仕途生涯中, 多次举行了入道仪式。正因为如此, 李白在相当一部分诗中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 贺知章曾称他为“谪仙人”。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 便是独立不拘, 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以来人的觉醒发展到巅峰的产物, 是盛唐精神高度升华的产物。

少年时期的李白, 涉世未深, 家乡多名山大川, 道教风炙, 侠士之多, 剑术之盛对他成长为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向往仙道, 渴盼出尘,

收稿日期: 2010-05-31

作者简介: 谢青芮(1984-), 女, 湖南澧县人, 助教, 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谢承力(1952-), 男, 湖南澧县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高职语文教学。

对这位生性豪放不羁而又一腔热血的少年有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时的蜀中还是一个任侠风气甚炽的地方,侠士们豪荡的风范,浪漫的生活方式,更增长了李白浪漫的气度。豪侠杀人可以不负责任,恣意纵横,快意恩仇正是少年人神往的境界。所以,历来的资料均有这样的记载:好任侠,喜剑术,好纵横之术^[2]。这种游侠思想使他重诺轻物,轻视传统,养成一种傲岸不屈和豪纵旷放的性格。这种性格伴其一生。在其诗中多有流露,如:“托身白刀里,杀人红尘中”(《白马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行》);

同时,这一时期充裕的时间,无有负累的单身生活,又给了李白漫游蜀中名山的大好机会。正是这些漫游生活的历练,把李白浪漫而富于幻想的性情打造得更趋成型。在此期间,李白也曾往来旁郡,游剑阁、梓州、成都等地。如这一时期的《蜀道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3]气魄宏伟,富于想象,充满浪漫色彩。他的这种“浮四海横八荒”的游历生活,对他的创作起着巨大的影响。自然山水的奇、险、怪、骇之状,是李白心目中自然之奇,人生之险的象征,其惊、叹、赞、美、真、幻、虚、实,是李白在自然探险中所经历的情绪波澜,主体已融入客体,内情亦化为外象。他透过山水倾吐对自由的向往。大自然中倚天欲倾的峭壁,九天悬落的瀑布,汹涌澎湃的江河,则使他体验到纵横驰骋,舒卷自如的自由意识的满足,鼓荡起他狂热的激情和不可遏止的创造力:“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4]。在诗中,峰峦挺拔耸峙的伟岸,昭示着独立和自尊的威严,李白笔下的山水,是经过其精神打造的人格化的自然。是自然赋予诗人睥睨世俗,傲视权威的能量和气势,他的浪漫豪放飘逸来自于山水带给他的启示。

在 42 岁之前的李白,思想比较复杂,儒、道、侠兼有。他最初的读书生活,纵横之术的学习,是为了追求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这是他一生热烈追求治国安民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但这一时期的李白,对入世做官并无太多兴趣,《新唐书》有记载:州中荐举李白参加有道科考试,他未响应。主要原因是道、侠思想起支配作用,他向往绝对的自由,厌恶污浊的官场,把权贵们视为粪土,特别是游侠生活令李白兴奋

不已。“游江陵、泛洞庭、登庐山、下扬州,后以湖北安陆为中心,西入长安,东游梁、宋、齐、鲁。”^[5]在此后的十几年间,遍览祖国山川,广交朋友,创作了许多抒写怀抱,赞美山水风光、表达真挚友情的浪漫诗歌。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酌》),又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诗歌的意象发想无端,去也无迹,随风变灭,又如天马行空,任意驰骋,想象丰富,夸张大胆,善于运用神话传说,结构自由活泼,情感起伏变幻,却又充分显示了浪漫色彩。

二、中年仕途坎坷 创作风格转变

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狂放不羁,才气横溢,诗名日高。天宝元年,李白南行入会稽,同吴筠亲善,吴筠被皇帝征召进京,所以李白也跟着到了长安。但是他到长安来,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的成就,而是要获得政治身份的认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到长安后,李白去见贺知章,贺见其诗文后,感叹道:“你,是谪居世间的仙人!”^[6]贺知章向玄宗介绍李白,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欣赏,下诏让他当翰林院供奉,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但这与李白的愿望相违,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屈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个角色,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幸辅之臣,发挥其政治作用,从而对唐王朝的政治产生影响。而这,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然而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他曾想走终南捷径以出仕,也曾投赠诗文,拜谒地方长官,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

对于李白来讲,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得高度的认同,就是要做辅佐君王的幸辅之臣,为天下黎民苍生排遣忧愁,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即便是见到了皇帝,依然是失败的人生。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

展鸿图大志预备的,就像孟子所说的:“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7](《孟子·公孙丑下》)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霸王气度,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他要表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在现实与诗书治国的理想相差甚远时,他常常饮酒游乐,过着放纵的生活。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进,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毕竟,伴随李白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所以有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名句。这是对现实不满的反抗抵触渲泄。

李白傲视群小的个性,让高力士脱靴子之事,终于让他遭到致命的打击,使傲岸不屈的李白,不得不在天宝三年自请还山,历史称为“赐金放还”。^[8]他的第一次从政活动彻底失败了,他怀抱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压抑和幻灭。一种怀才不遇、愤世疾俗的情绪不断地从他的诗里流露出来。如:“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痛苦的人生体验通过个人的主观感受强烈地呼喊出来,所以在《行路难》(其一)中诗人“欲渡黄河冰塞川,将上太行雪满山”,痛感人生之艰难,世事险恶,其实这是对当时唐王朝朝廷内部腐朽黑暗勾心斗角的抨击。这种对现实的揭露不像杜甫那样低怨衷愁,而是千转百回,迂回不屈,化为倔强的强音,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直抒胸怀“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三年的翰林生活使李白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玄宗后期的政治黑暗与腐朽有了清醒的认识,明白此时的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的政治理想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飞跃,具有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批判,这是李白由浪漫转向现实的正式标志。

三、晚年命运多舛 慨叹生命遭际

在李白人生历程的最后二十年间,徜徉山水仗

剑行侠的浪漫做法趋于冷寂,诗人虽游弋太空,却是缅怀现实的。他的飘逸,不是弃世绝尘,而是愁情难消,故通过游仙的形式,将心别寄。中年后的李白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道侠观念居于下风,但始终徘徊在心灵深处,时常跳跃出来,共同抒发诗人拯物济世的情怀,但这已不同于青年时期的无牵无绊的大胆浪漫,在这些仍然雄奇豪迈的诗句背后已沾满诗人厚重的苦闷,矛盾的郁怀,自我个性被挤压在狭小的规范中不能自由激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典型的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求仕与隐遁等思想行为复杂交织的诗作。宦途失意后,诗人对现实极为不满,面对坎坷仕途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其一)的慨叹。他“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又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既“举怀消愁愁更愁”,又“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其中的原因是和现实社会的苦难遭际分不开的。

长安仕途的失败,使李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其生活更加狂放,他常醉于酒中,在自我的世界里进行着矛盾的斗争,他既为国家命运忧心如焚,又为自己报国无门含恨无穷。这一时期中李白写下了一系列反映他痛苦复杂心情的诗篇,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古朗月行》等一系列诗,悲恨与失落交织而成的主观情结格外地凸出。安史之乱的爆发,让李白看到了战乱造成人民的悲痛和国家遭受支离的哀伤,尤当他入狱流放夜郎面对生死威胁时,其心理结构的平衡被打破,高傲的诗人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自信和狂放被痛苦和无奈所代替。经历人情反覆和世故之无情后,诗人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痛楚,心灵受到重创,他的人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无情的现实造成李白心理的遽变,使其狂放和自我的心灵遭到了冲击,他不再沉迷于自我的精神世界里怒吼,而是多悲叹自我之无力和无情。现实对他的身心折磨,给诗歌也染上了一层凄凉哀伤的色调,带有沉郁顿挫的意味。“伯乐剪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园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天马歌》)。^[9]浅显的诗歌语言加上富有悲伤色彩的意象,使诗显得低沉、哀婉。

此阶段李白的内心不再是“大道不得出”的自我迷途和徘徊,自我的崇拜被冰冷的铁窗无情地粉

碎,代之的是穷途之恸,含恨不已。如《江夏赠韦南陵冰》“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10]写出诗人流放夜郎时苦闷无比的心情,似乎整个天地间都充满着压抑无比的气氛,似乎只能借助于酒才能消除这愁。

四、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诗作

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后,于洛阳与杜甫相遇,二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接着李白又“北游燕蓟,南返梁园,往来于宣城、金陵之间,游历山川,练丹遁隐,狂歌痛饮,消磨雄心”。^[11]这时,怀才不遇的愤懑,傲岸不屈的豪气,人生易老的悲叹,及时行乐的狂放,以及对国事的关切,对民族的同情等复杂地交织于李白的创作之中。使后人不但可以窥见诗人苦闷的倔强的内心世界,也可一窥当时唐王朝日趋腐朽没落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至今让人们传诵:“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赠蔡山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远别离》);李白用自己独特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评价,把广阔的历史现实幻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耐人寻味。

李白的理想与追求虽然在现实中不断遭到挫折,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信心,放弃追求,所以他的诗里总是激荡着一股坚定乐观的豪迈精神。诗人以情感的起伏不止,急遽变化来显示思想的痛苦与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对朝廷的昏暗,仕途的艰难满怀不满;另一方面,积极用世的态度,对自己才能的充分自信、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使他对前途仍抱热望。李白从其政治思想出发,对阻碍唐代社会进步的种种腐朽黑暗的现象和事物,予以深刻的揭露大胆的批判。天宝年间的李唐王朝虽然尚处于强盛的顶峰,却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朝政开始由开明转向腐败。李白长安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痛切的感受。如《古风》二十四(“大车扬飞尘”)即以唐玄宗宠信宦官,荒于嬉戏,腐败昏庸为题材,通过描写宦官、斗鸡者恃宠骄恣,飞扬跋扈,抨击了是非颠倒,善恶不辨的污浊现实。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很多是这方面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

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羨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诗歌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当时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等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12]

天宝十四年,爆发了“安史之乱”,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又西上庐山,隐于屏风叠,次年冬,永王李璘兵败被杀,李白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后遇赦得归。李白亲睹李唐王朝由盛转衰,其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仕途坎坷,一代天才,老年偏逢战乱,目睹建功立业的“济天下”之愿化为泡影,怎不令诗人感慨万千,特别是晚年流放夜郎,兵败之事令诗人对黑暗的现实,崎岖的人生不得不重新审视。在这期间,李白的诗歌更贴近于现实,多反映时代战乱带来的灾难,抒发渴望杀敌靖境,为国驱患的抱负,如《古风》十九、《咏王车巡歌》等,他同情百姓疾苦,用沉重的笔触陈述他们苦难的生存状态,如《丁都护歌》等。他还用辛酸的笔触表现边塞生活的凄凉艰辛,如《战城南》《子夜吴歌》等,如《战城南》中“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让人读罢心伤。

安史之乱以后,李白的笔触转向了对安史之乱倒行逆施罪恶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感情。如《古风》十九(“西上莲花山”),此诗大约作于安史叛军攻陷洛阳以后。诗人通过游历仙界和俯视人间的对比,既反映出独善与兼济的矛盾,更表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情。诗人写幻游的神仙境界,神奇美妙、优雅高洁,以之与黑暗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诗人对污浊现实的憎恶。诗人正要借仙人“驾鹤凌紫冥”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眷恋与挚爱,又无限留恋人间,当他“俯视洛阳川”看到的是“茫茫走胡兵”,“流血涂草野,豺狼尽冠纓”^[13]的战乱惨象,字里行间流露出无比的愤恨。诗人通过仙界与人间的对比深化了对祖国和人民关注的主题。直到晚年李白仍“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

韦太守良宰》),打算入李光弼幕,参加防御安史残余势力南侵的斗争,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浪漫主义诗人对现实关注的情怀。诗人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突有时又激化为决绝的态度,表现为鄙弃功名、鄙弃世俗、蔑视权贵,不受名教礼法约束,以布衣而平交王侯的自由放逸精神,其《梦游天姥吟留别》即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酣恣。

五、结语

李白一生不满黑暗现实,关心政治,忧虑国事,希望建功立业。其诗多强烈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关怀时局的安危,热爱祖国山川,同情下层人民,鄙夷世俗,蔑视权贵;语言清新自然,善于运用神话传说,把读者带入光怪陆离的境界,强调个人主观感受,勇于展示自我个性,但这些雄奇、飘逸、奔放、汪洋恣肆的诗歌背后蕴含着极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力量,令人一读难忘,这种高度完善,炉火纯青的境界,后世无人可及。

参考文献:

- [1] 刘扬忠,乔力,王兆鹏.唐宋词精华分卷[M].北京:朝华出版社,1991.
- [2] 杨岳华.论李白的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J].黑河学刊,2008 136(4).
- [3][10] 陈婉俊.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9]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8][12]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零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7] 杨伯峻,杨逢彬,注释.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
- [11] 罗宗强,郝世峰.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 [13] 马道衡,王建华.试论李白《古风》的批判意识[J].晋中师专学报,1998,29(2).

[编校: 海燕]

(上接第 72 页)

参考文献:

- [1] 唐才常.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摺[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4
- [2][4][5] 交涉学第二[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1966 2526 2523 2524
- [3][7][10] 交涉学第四[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1966 2588 2582 2580
- [6] 交涉学第三[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1966 2582
- [8][23] 谭嗣同.仁学[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42 344
- [9]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75-76
- [11] 掌故学第四[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1966 661-662
- [12] 唐才常.公法通义自叙[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96
- [13] 交涉之学[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1966 2760
- [14] 唐才常.论情法[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 36

- [15] 唐才常.交涉甄微[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46
- [16]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90
- [17] 唐才常.辨惑(上)[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7.
- [18][21] 皮嘉祐.醒世歌[J].湘报,第 27 号.
- [19] 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五次讲义[J].湘报,第 25 号.
- [20] 陈宝箴.陈右铭大中丞南学会第一次讲义[J].湘报,第 1 号.
- [21] 皮嘉祐.醒世歌[J].湘报,第 27 号.
- [22] 陈宝箴.陈右铭大中丞南学会第七次讲义[J].湘报,第 31 号.
- [24] 唐才常.论兴亚议会[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8
- [25] 谭嗣同.论中国情形危机[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98

[编校: 海燕]